

紫禁城內武英殿建築群

## 名山事業

# 武英殿刻書始末

林天人

### 幽深寧靜的武英殿

康熙十九年（一六八〇）

十一月，清廷頒旨於武英殿造辦處下，增設皇室修書機構。以出版「殿本」著稱的武英殿，於是展開一頁熠熠的刻書史。

武英殿位於清宮外朝西路熙和門與西華門之間北迤，其建築與周圍各殿的一組建築，如敬思殿、凝道殿、煥章殿、壽齋等共六十三楹，為明代所建。武英殿因其殿處境幽深、寧謐，明初為皇帝齋居之處，亦曾於此召見大臣議事；明末闖王李自成破京也在此即位；清初攝政王多爾袞亦以此為論政場所。據清吳長元《宸垣識略》載：「武英殿崇階九級，環繞御河，跨石橋三，前為門三。內殿宇二重，前貯書版。北為浴德堂，即修書處。其後為井亭。清代定鼎之初，曾設繙刻書房於太和門西廊下，揀

旗員中諳悉清文者允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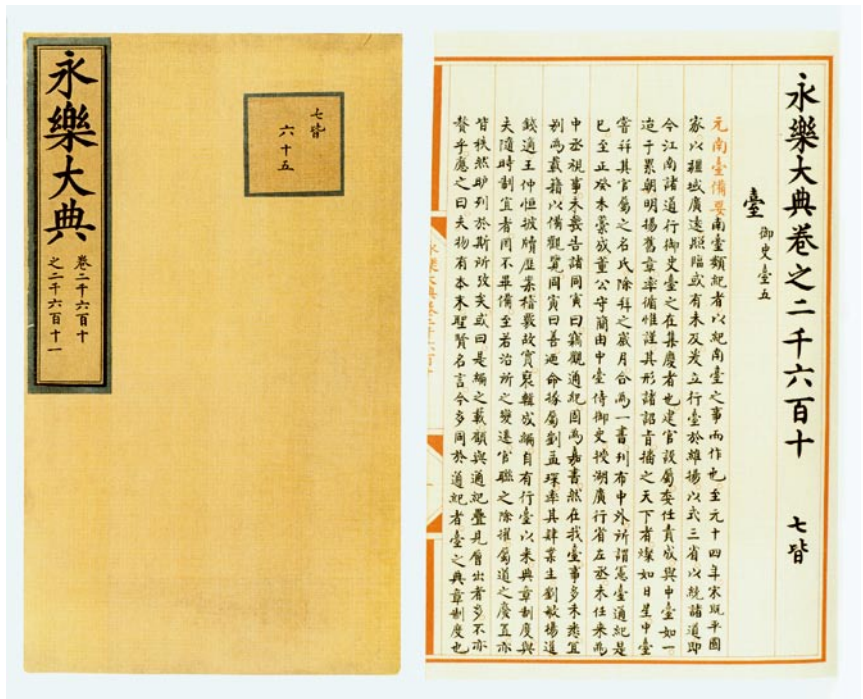
### 從經廠本到殿本的發展

在武英殿成為清代內府刻書之處前，清初刻書的風格，仍留明代餘韻；清宮刻書所屬的機構與刻印工匠，俱為前明所留。直至武英殿刻書處成立後，因其所刻之書精美、風格講究而成為中國圖書版本上的佳構。陶湘《清代殿版書始末記》載：「清代殿版書，實權輿於明代經廠本。惟明以司禮監專司，清則選詞臣從事耳。順治一朝，纂刻書籍，均經廠原有工匠承辦，故其格式，與經廠本小異而大同。」

明代內府刻書原由宮內一些機構負責，司禮監成立後，其下轄經廠，主「經書印版及印成書籍，佛、道、蕃藏皆佐理之」（參：明呂志《明宮史》）；司禮監為明初設置十二監之一，其地位為十二監之首。根據明沈德符《野獲篇》載：司禮監下設漢經廠、番經廠、道經廠等；分別刊



武英殿本《明史》



《永樂大典》書影

刻本國四部、佛經、道藏。因以刻經為主，「經廠本」之名遂掩「內府本」。經廠本多為黑口、白紙、趙體字，極易辨識。書籍裝幀雖美觀，但校讎不精，後人並不重視。清顧廣

圻在《廣弘明集跋》中，謂：「明中葉以後刻書無不臆改，刻成又不復細勘，致令訛謬百出。」訛謬情況嚴重的，甚且整段、整頁脫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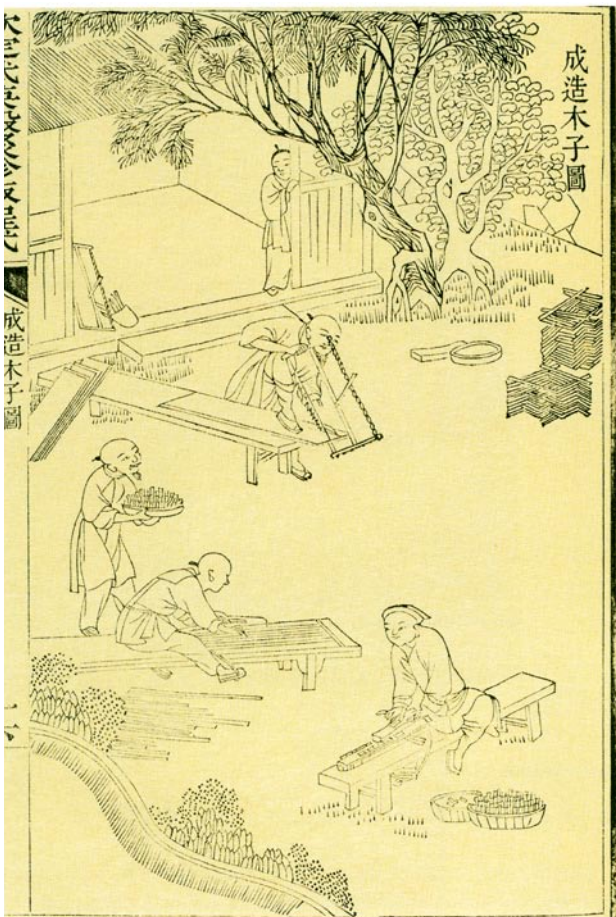
康熙十二年（一六七三）上命廷臣補刊經廠本《文獻通考》及《性理大全》的脫簡；書成，卷前冠以聖祖御序。因為兩書補版工作是在武英殿進行的，後世亦將此年，訂為武英殿刻書始年；但其真正正式頒旨是在武英殿成立刻書處，係在康熙十九年（一六八〇）。根據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）的內府抄本《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·武英殿修書處》，載：「康熙十九年十一月，奉旨設立修書處，由內務府王大臣總其成，下設兼管司二人，以內務府官員兼任。下又設監造員外郎一人，副監造、副內管領一人，委署主事一人，掌庫三人，委署掌庫六人。設書作、刷印作。書作司界劃、托裱等職；刷印作管理寫樣、刊刻、刷印、摺配、裝訂等職。」

「此後，大凡欽定、御製、敕撰諸書及正經、正史群籍，均由武英殿校定版行。」

武英殿刻書在風格上別於前明，特別是表現在刊刻書籍的字體上；這大概與康熙對此一問題的重視有關。在補明經廠本《文獻通考》的御製序中，康熙對刻書字體發表過個人看法，他說：「此後刻書，凡方體字均稱宋字，楷書均稱軟字，雖雜出眾手，必斟若劃一。」康熙所好的字體，世稱「館閣體」；是一種非顏非柳亦非趙的字體。《清朝野史大觀·詠館閣體詩》謂其字體「軟而圓、勻而細。松烟墨、筆毫紫。個個簪化妝，行行紅格子；上下兼四旁，而無不方矣」。康熙之所好，流風所及不僅影響了千萬學子學書的風氣，無形中也決定了清初雍正、乾隆兩朝刻書的風格。清洪亮吉《北江詩話》，云：「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，謂之『館閣體』，類皆千手雷同。乾隆中葉後，四庫館開，而其

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書影



《武英殿聚珍版式》所繪工作場景圖

風益盛。」字型、字體的統一，令清內府的刻書朝向規範化、標準化發展。

### 殿版書中的雙壁

武英殿成為清代內府正式的校刻書處後，刻書的數量逐年增加；康熙一朝內府刻書約有五十餘種，五千餘卷，門類齊全，凡經、史、詩文集子、天文、曆算……等。特別是與

儒家相關的著述與儒家經典的注釋，刊刻更不遺餘力。從刻書的方向來展現康熙「稽古右文」的企圖，以儒家的治術為治世的基礎，其目的當然與倡導維護君統與駕馭臣民攸關。

到了雍正朝，內府刻書的量更以倍數增加；雍正臨朝十三年，內府刻書達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二卷。其中特別值得稱述，是雍正時期以銅活

字刻印了康熙四十五年（一七〇六）繕寫成書的《古今圖書集成》。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凡六編三十二典、六千一百零九部、一萬卷、目錄四十卷。卷首冠以雍正御製序文，稱：「聖祖命廣羅群籍，分門別類，統為一書，成為冊府之巨觀，極圖書之大備，而卷帙豪富，……特命蔣廷錫等董司其事，督率在館諸臣重加編



揚州詩局所刻《全唐詩》書影

校。「可惜！這套銅活字版，到了乾隆時期因京師錢貴，而被奏准毀銅字以供鑄錢。」

乾隆一朝，清代武功、文治都臻巔峰狀態；內府刻書也在原有的基礎下蓬勃發展。除了校刻了《十三經注疏》外，又以明國子監刊本《二十一史》為底本，再增刻《舊唐書》、《明史》及從《永樂大典》輯出《舊五代史》，合編為武英殿版《二十四史》。陶湘於《清代殿版書始末記》載：「乾隆一朝，四年（一七三九）詔刻《十三經》、《二十一史》於武英殿刻書處，特簡王、大臣總裁其

事，殿板之名遂大著。十二年（一七四七）刻《明史》、《大清一統志》，次刻三通，再次刻《舊唐書》。凡十二年，前刊印者，其寫刻之工致，紙張之遴選，印刷之色澤，裝訂幀之大雅，莫不盡善盡美，斯為極盛時代。」乾隆一朝，內府共刻書一百五十三種，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五卷。

乾隆時期，武英殿刻書另一項值得稱述的，是以木活字詔刻的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；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刷工程。乾隆三十八年（一七七三），開「四庫全書館」，校輯《永樂大典》之殘卷零篇，並蒐訪天下佚書；最後彙輯成《四庫全書》。《四庫全書》成，上以「人所罕觀，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」為由，另彙編成書。乾隆採金簡之議，以木活字鑄刻，此即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之由來。（參《宮史續編》卷九四，〈清高宗提武英殿聚珍版十韻〉）金簡所刻這批木活

字，刻書後存放武英殿，未再印行其他書籍；後被殿內值勤衛兵用來烤火取暖。（參張秀民，《清代的木活字》）

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共圖書一百三十八種，二千四百卷。其數量、種類在規模上或不如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但其刻工精良，在刻版印刷史上仍屬精品。後世亦將《聚珍版叢書》與《古今圖書集成》視為印刷工程史上的雙璧。

### 殿版書的價值

嘉慶以後，內府刻書由盛轉衰；刻書內容也較為平淡。其中較值得稱述的，是嘉慶十九年（一八一四）編纂的《全唐詩》；此書係由揚州詩局所刻印。其後道光、咸豐以降，國事螭蟻，武英殿刻書日益式微。陶湘云：「道光、咸豐兩朝，天下多故，稽古右文，萬機無暇。同治一朝，大亂甫定，天子沖齡，此事遂廢。八年（一八六九）夏，武英殿災，凡康熙二百年來之藏

書儲版，一炬蕩然。……終同治一朝，闕寂無聞，此為極衰時代矣。」（參陶湘《清代殿版書始末記》）開創一代風雨名山之業的武英殿，最終落得「闕寂無聞」的下場！

武英殿的刻書事業，最後雖悄悄落幕，但它對於清代印刷出版史或文化史上，至少有幾項重大的意義：

一、武英殿為皇室的印刷機構，其所刊刻的圖書當然與皇朝的典章制度有關；其次是清初的統治，既以「稽古右文」為號召，來箝制或籠絡當時的知識界，因此御纂、敕修、欽定經史文集等圖書，自然成為印刷量最多的出版品。但從另一個角度看，通過整理、輯校、匯編種種方式，保留大量宮中深藏的古籍；對中國古代圖書的保存、流傳與古代學術的發展，有非常正面而積極的作用。

二、武英殿的刻書，相當程度地保存了古籍，根據統計有清代內府刻書總量

約六百三十三種，五萬四千零二十六卷（吳哲夫先生曾以陶湘《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》為底本，核對目前台灣所藏殿版圖書情況，五百九十五種，其中經部一百一十五種、史部二百三十四種、子部一百〇七種、集部一百三十五種、叢書四種）；這數量遠超過歷代官刻圖書之數。另清代以滿族入主中原，統治期間除翻譯經史文集為滿文外，也編印了滿、漢合璧的圖書。

三、武英殿既是皇室開館，刊刻之書自然講究版型、行款、色澤、裝潢，乃至於紙張、墨色、字體、圖繪套色都屬出版印刷的上上之選。因此，目前傳世的殿版圖書，都成為收藏單位以珍貴文物來保存。

四、殿版書的刊印與書中所繪版畫，充份表現清代刻書與印刷套繪的水準。如套印的技術源自明代，卻發皇於清代。明代的套印一般是兩、三色，四色則少見，五色祇用

於箋譜、畫譜等。但殿版書中多色套印尋常見，康熙年間的《御選古文淵鑒》，即用紅、黃、綠、墨、藍五色套印；其套色的形式與技巧也較明代成熟。

目前殿本書被各界視為珍藏的文物，亦有多處收藏殿本。不過以質和量而言，收藏最佳仍屬國立故宮博物院。目前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殿本書有五三二二一冊；前云銅活字版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及木活字版《武英殿聚珍叢書》一百三十八種、《古香齋袖珍十種》俱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。民七十二年，蔣復璁在《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》序中說：「本院收藏普通本線裝圖書，係包括殿本、史館、觀海堂各庫所貯。殿本庫藏者，皆繕寫進呈及武英殿所刻印，遜清歷朝御製或敕撰之書。殿本圖書，今傳世雖尚不乏，然藏者咸無本院之豐。」  
洵非虛言。